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档案文献·乙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 ——思想资料辑录（上）

主 编 ● 俞荣根

副主编 ● 袁春兰 丁宇飞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档案文献·乙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

——思想资料辑录(上)

编委会名单

主 编：俞荣根

副 主 编：袁春兰 丁宇飞

编 委：俞荣根 袁春兰 张 渝 丁宇飞
张楠楠

主要编纂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丁宇飞	王明辉	李 杰	刘岸兰
肖清彬	张林杰	张 渝	张恒静
张楠楠	张 燕	张 然	俞荣根
袁春兰	高晓丽	周奇仕	雷 佳
葛晓库	戴杰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 / 余荣根主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29-11348-3

I. ①董… II. ①余… III. ①董必武(1886-1975)—文集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3530号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

DONG BIWU YU KANGZHAN DAHOUFANG—SIXIANG ZILIAO JILU

主编 俞荣根 副主编 袁春兰 丁宇飞

责任编辑:曾海龙 林 郁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 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48.75 字数:772千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348-3

定价:97.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大铨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红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忠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学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天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天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奎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瑞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景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国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兴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谦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鹏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铭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小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永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冲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维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秀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德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南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傅高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起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回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会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文字语言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这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说明

1938年至1946年，董必武在抗战首都重庆工作战斗近8个年头，为神圣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人民的独立、民主、自由、解放事业立下丰功伟绩！为培育红岩精神作出了卓越贡献！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以下简称《辑录》）选编董必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诗词、题词、言论等文献。为完整展现这一时期董必武的思想资料，《辑录》的选编以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期间为主体，上溯及抗日战争开始之时，即他任职于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两个阶段，下延至与周恩来一起组建中共中央南京局并奉命最后撤离南京为止。时间跨度长达10年，即从1937年3月至1947年3月。《辑录》还收入了此后董必武有关回忆、缅怀、纪念抗战的两篇文献和10首诗。

《辑录》与《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工作全程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在资料方面是同时、同步搜集的，均来自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公开出版的著作、论文。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客观性、广泛性，采取竭泽而渔、应收尽收的方法，逐日逐版查阅全部《新华日报》、相关时段的《解放日报》和《群众》周刊等，检索并阅读直接或间接的相关著作370多种、论文540多篇。

《辑录》共收文献334件，均来自公开发行的报刊和公开出版的著作。文献分四大类：

第一类为文选，共87篇，包括董必武撰写的文章、电文、信件，以及

他的演讲、发言、谈话、声明、答记者问等。这些文献是本资料选集的主体。其来源如下：《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9篇，《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本）33篇，《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篇，《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1篇，《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1篇。另有辑自《群众》周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原载文稿后又参照《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本）作文字和注释校订的23篇。此外，有7篇直接选自《新华日报》，有1篇直接选自《群众》周刊。

第二类是诗选，共148首。其出处为：《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17首，《董必武诗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2首，《董必武诗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78首，《董必武诗稿手迹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17首，《当代名家书董必武诗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10首，《怀安诗社诗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首。另有选自《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7首、《董必武诗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8首、《董必武诗稿》3首、《当代名家书董必武诗作品集》4首、《董必武年谱》1首，共23首诗，在写作发表时间、个别文字上各本有所不同，为求至当，查阅了《新华日报》、《董必武诗稿手迹选》、《怀安诗社诗选》、《吴玉章诗选》等所载版本，经反复互校后选录。凡此均在“本辑录编者注”中一一作出说明。

第三类为题词与挽词选，计20幅。其来源：《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4幅，《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1幅，《抗战时期重庆工人运动刍论》（载《抗日战争中的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幅，《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1幅，《梦醒：回忆我的母亲廖梦醒》（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1幅。其余12幅直接来自《新华日报》。

第四类是附录，共编录董必武抗战时期的其他文献79篇。所谓“其他文献”，指董必武所主持、所参与，也可能是他亲自拟稿，但系两人以上署

名，或以组织名义发表与签发的电文、信件、文稿、声明、谈话、议案等等。附录是反映董必武抗战时期思想和活动不可或缺的文献，也是编者用心搜寻和编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的出处如下：直接录自《新华日报》36篇，《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和《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14篇，《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9篇，《南方党局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4篇，《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本）5篇，《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1篇，《陈独秀之死》（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1篇，《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1篇，《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1篇，《陶行知全集（第四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篇，《中国共产党抗战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1篇，《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1篇，《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1篇，《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篇，《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1篇，《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1篇。以上各篇内容，凡辑自《新华日报》者，均按《新华日报》原文作了校订。

综上所述，《辑录》选自《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本）、《董必武诗选》、《董必武诗稿》、《董必武诗稿手迹选》等董必武著作203件，选自《董必武年谱》、《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国民参政会纪实》等各种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著作、文集52件，再加上前文所说的23篇从《群众》周刊、《新华日报》、《解放日报》辑录后再参照《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本）进行校订的文稿，共计278件，都来自经过整理编辑并公开出版的图书。剩下56件是从《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两种抗战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刊中直接选录的。其中，有文稿8篇、题词12件，还有附录中的36篇珍贵文献，都是本《辑录》编者第一次从原载报刊中发现的。

鉴于各种图书的注释格式各有特色，为避免混淆不清，我们在编辑时

一概加了题注，所有注释改为脚注。题注和脚注中冠以“本辑录编者注”、某书“作者原注”或某书“编者原注”加以区分，一为尊重原作者和编者的知识产权，二为方便读者。本书选自公开出版图书的不少文献，可以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解放日报》中查到初次发表的版本。遇到这种情况，也以“本辑录编者注”的方式说明该文献原载何处，当时的标题是什么等。如有所校勘也一并作注。同一篇文献，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初版文本与《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国民参政会纪实》等著作中的版本往往会有不同，遇到这种情况，原则上以著作中的版本为准，不再复原初版文本，初版文本也不作为异文收入。

凡选自公开出版图书的 278 件文献，编录时在遵从原书的前提下，对其中的写作发表时间、文字等明显有疑义者，或作了校正，或作出说明。试举 2 例加以说明。

例 1：文稿第 51 篇《在重庆民主集会上的讲话》。该文原载《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25 日第二版，原标题为《实行民主挽救危局，只有召开国事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黄炎培日记（第 8 卷）1942—1944》第 314 页记述了对这次会议董必武发言内容的回忆，可以相互校订。《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收有该文。我们于 2011 年 6 月从《新华日报》辑录该文，编入《董必武抗战时期文选（初编）》，2011 年 11 月得到新印行的《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后，据此作了校正，标题改同《文集》一致。该文第一、二句，《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25 日第二版“本报讯”中的原文为：“政府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一千二百万壮丁、三千万担的粮食，种种捐税都承受了。”《董必武文集（第一卷）》（征求意见稿）第 213 页的文字与之相同。查《新华日报》1944 年 9 月 26 日第二版“本报重要更正”，说：“昨日报道的董必武讲话中，‘三千万担’是‘每年七八千万担’之误。”由于我们至今未找到仍应坚持“三千万担”的依据和理由，因此，这次编录该文时从《新华日报》更正之说，将上述文字调整为：“政府要求人民的，人民都做到了。一千二百万壮丁，每年七八千万担的粮食，种种捐税都承受了。”

例 2：诗稿第 135 首《贺吴老六十有八寿辰》。这首七律原载《新华日

报》1946年12月30日第四版“新华副刊”，20世纪80年代以来见于《吴玉章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0页，《当代名家书董必武诗作品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49页、《董必武诗选》（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且标题有所不同：《新华日报》为《贺吴老六十有八寿辰》，《吴玉章诗选》是《玉章同志六八华诞之庆》，《董必武诗选》中用的标题为《贺吴玉章六十有八寿辰》。我们权衡结果还是采用了《新华日报》最早发表这首七律时的原标题。此外，四个版本中，第五、七、八句中有三处词语用字亦不一致，我们照例通过注释一一说明。为方便读者欣赏、理解这首诗，还附上了吴玉章的答谢诗《答谢董老寿诗》。

诸如此类校勘、补正、反复斟酌以求允当之处，尚不在少数，均以“本辑录编者注”形式说明。

《辑录》和《实录》是姐妹篇，各有分工、各有着重，相互照应、相互参照，有相得益彰之效。《辑录》中收录的文章、讲话、采访记录、诗、题词等，虽都有题注说明，但欲知其详细背景和过程，还需查阅《实录》；而董必武的一些诗句、题词、篇幅较短的言论，也收录于《实录》之中。还有一些重要文献，一时未能找到原文或全文，《辑录》中只好暂付阙如，但《实录》中则明确记有题目、写作或发表时间、发表何处等重要信息，甚至还简单介绍了主要内容。

《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和《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工作全程实录》的编纂，得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及其理论处、“抗战工程办”的大力指导和帮助。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以及该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瑞广先生、副秘书长陶晓林先生，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良羽先生等，给予我们很多支持，并提供宝贵的编辑意见和建议。西南政法大学图书馆与重庆市图书馆在资料借阅、查找、复制方面予以方便和优惠。借此机会，谨致衷心谢忱！

《辑录》和《实录》两书的资料搜集始于2011年6月28日，至8月28日完成初编，前后恰好整两月。其时重庆暑热正盛，气象台报称，这是重庆有气象记载以来，高温天数最多的一年，达60多天。课题组成员抓紧

学校放暑期的难得机遇，起早贪黑，加班加点，乃至吃睡都在工作场所。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又是董必武诞辰125周年。大家怀着对辛亥革命元勋、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一大代表、共和国创始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和新中国法制建设领导人——董必武无比敬仰的心情，以及对课题研究高度负责、求真求实的严谨学术精神，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抢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并于2011年10月中旬印制出40多万字的《董必武抗战时期文选（初编）》和70多万字的《董必武抗战时期实录（初编）》征求意见本，及时提供给11月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2011年会”以征求意见。会后，又经过半年多的资料再搜集和补充、修改，遂成现在这个规模，两本书稿总计增添了16万字左右。

本课题在研究性质上大体可归入既有资料整理编纂之属，又忝于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系列，质实而定名，故将初编时的书名改为现名：《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思想资料辑录》和《董必武与抗战大后方——工作全程实录》。

由于查阅资料的客观条件有限，更由于搜寻资料的主观努力和学养不足，本书在资料和编辑上存在的缺陷肯定不少，真诚祈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教。

编者

2011年9月10日第27个教师节

2012年6月30日修定

目 录

总序	章开沅 1
编辑说明	1

董必武抗战时期文选

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四日)	3
关于武汉政局及湘鄂赣、鄂豫皖等地情形致中共中央信	
(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	11
关于最近工作情形致张闻天、毛泽东信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15
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十月)	18
致洛甫并中央诸同志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	20
张沈等抗敌救国之主张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三日)	22
怎样动员群众积极参战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	24
武汉的民众动员和组织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28

我所认识的钱亦石先生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31

回忆第一次谒见中山先生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 33

就国民参政会问题答记者问

(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35

今年的“九一八”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 37

目前抗战形势和《新华日报》

(一九三八年十月八日)..... 42

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的展望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46

日寇企图搬演新傀儡

(一九三九年二月五日)..... 49

五一节与我国工人运动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53

我国抗战二年来的民众运动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 59

献给新四军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之涂罗等十烈士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 66

“八一三”的教训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 69

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遇害烈士启事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二日)..... 72

关于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任务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75

《新华日报》创刊二周年纪念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 77